

未能很快引起重视，直至一百多年后的1945年由学者杨家骆、马衡、顾颉刚等组成考察团进行科学考察，才为学界所重。张澍一生钟情学术，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执着的追求精神使其得获他人所未获，凉州碑和大足石窟都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注释：

① [宋] 窦仪等撰、薛梅卿点校《宋刑统》卷19，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② [唐] 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19，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页。

③⑤⑥⑨⑩⑪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362-363、367-368、110-130、404-405、378-379页。

④ 谢重光、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5-121、155-167页。

⑦ 李范文：《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台湾《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6卷第3期。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仁宗庆历八年(1048)正月辛未”条。

⑩ 《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金史》卷110《赵秉文传》。

⑫ 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141页；[俄] 克恰诺夫：《吴兢〈贞观政要〉西夏译本残叶考》，《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年增刊（西夏研究专号）。

⑬ 史金波：《西夏〈天盛律令〉略论》，《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⑭ 《辽史》卷45《百官志一》。

⑮ 《辽史》卷61《刑法志上》。

⑯ 《金史》卷8《世宗纪三》。

⑰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6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4-174页。

⑱ [清]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⑳ 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史金波：《西夏“秦晋国王”考论》，《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㉑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0“仁宗天圣八年(1030)十二月丁未”条。

㉒ 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

㉓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真宗景德四年(1007)十月庚申”条、卷121“仁宗宝元元年(1038)正月癸卯”条。

㉔ [清] 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卷首地图。

㉕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6卷，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007页。

㉖ 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9页。本文作者对译文有所修改。

㉗ 白滨、史金波：《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1982年第3期。

㉘ 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184页。

㉙ “朝廷”二字，在西夏文中原意为“世界”，又可译为“朝廷”或“京师”，这里可译为“朝廷”。

㉚ 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1982年第3期。

作者简介：史金波，男，1940年生，河北高碑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1。

西夏汉文乾祐十四年安排官文书考释及意义

孙继民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第300页收录有一件编号为 ИНВ. NO. 2208 的西夏时期汉文文书

图版，该书后附的《附录·叙录》有此件文书的介绍，并拟题为《乾祐十四年(1183)安排官文

书》，称：

西夏写本。西夏文刻本经摺装《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封套裱纸。未染麻纸。高24，宽29.3。多层纸粘叠。共6行。行楷，墨色浓匀。前3行小字，第1行被裁去一半。有“一限？春善。[乾祐十一年]□/为文，其不见有文契，知见人没赏（？）/来，收索不与”等字。第4-5行字稍大：“右箭付三司芭里你令布，/准此。乾祐十四年（1183，仁宗在位）十一月初日”。第6行大字：“安推官”，下为押印。另，天头粘纸高20，宽5.3。共3行，行15字。行楷，墨色浓匀。字迹同前。有“十天内交还钱[陆千捌？捌伯]？/外欠钱叁千叁？柒伯文。收索不与，乞/索打算”等字。

背粘西夏文文书。

根据以上介绍，可知所谓西夏乾祐十四年安推官（所称“安推官”有误，应为“安排官”。理由详下）文书拆自《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经帙，系多层纸粘叠。又据文书图版，安排官文书表层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中间部分为安排官文书的主体，即《附录·叙录》所录写的6行文书；天头部分即《附录·叙录》介绍的3行文书，系横黏于主体文书之上，与安排官文书形成90度夹角；地脚部分正面无文字，背面为西夏文草书。

关于安排官文书的主体部分与天头部分文书的关系，如《附录·叙录》所述，二者都是“行楷，墨色浓匀”，并且字迹相同。从图版看，二者不仅字体、笔迹、墨色相同，而且主体部分前三行文字各行行距也与天头部分文字的行距也相同，其中文字内容都有“收索不与”等语，因此可以推断二者原系一件文书，后因制作经帙而被裁成两段。鉴于主体部分系一文书残尾，则天头部分文字显然在前。根据以上已知的二者关系，可在编者录文的基础之上将安排官文书重新释录、复原如下：

[前缺]

- 1 拾天内交还钱陆千捌□捌伯□
- 2 外欠钱叁千叁 柒伯文。收索不与，乞
- 3 索打算。

[中缺] —

- 4 — 限公春善乾祐十一年 典到
- 5 为文，其不见有文契，知见人没赏
- 6 来，收索不与。
- 7 右箭付三司芭里你令布□
- 8 准此。乾祐十四年十一月初 日

9 安排官（此处有押印）

以上录文是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编者原录文的基础上重新释读而成，其中与原录文的不同之处是根据图版更正了两处文字释读错误，补录了两处文字漏释。两处释读错误一处是编者将4行首字误释为“一”字，此处应是唐宋时期公文和私家著述中常见的事项符号“—”而非作为汉字数字的“一”。这一点从本件的文书格式看也能得到印证。从图版可看，在4、5、6三行文字中，4行文字高出5行、6行近三格，显然此三行文字在原文书中是单列事项，而4行文字高出其它两行则其首字当然非事项符号“—”莫属。另一处是编者误将9行“安排官”的“排”字误释为“推”字。我们之所以释为“安排官”，不仅从图版看9行“安排官”的“排”字绝非“推”字，而且西夏官制中设置有“安排官”一职还可以从其他文书和出土的西夏考古文物中得到证实。例如《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第281页、第286页西夏南边榷场使文书中分别有“银牌安排官所”（иНВ. NO.315）、“准安排官头子”（иНВ. NO.354）等语，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一号墓所出残木塔顶部题记中也有“故亡考任西路经略司兼安排官”等语，^①均可证实西夏有“安排官”一职，《乾祐十四年安推官文书》原录文作“推”肯定有误。两处文字漏释补录，一处是4行的“公”字，另一处文字是4行的“典到”两字。从图版的电脑放大效果看，前一处的“公”字结构比较明显，后一处两字残存的左侧笔锋类似“典到”的左部，因此作以上补录。

一、关于安排官文书的公文种类属性

以上安排官文书虽然前缺，并不完整，但从其尾部残存的形式可以判断出文书的性质。从文书看，8行的“乾祐十四年十一月初 日”是文书的年代落款，7行、8行的“右箭付三司芭里你令布□准此”则是文书内容的结束语。根据宋代文书的格式，凡是文书结束语位置有“右箭付……准此”句式的文书，其性质便是箭子。例如山西灵山所出宋代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箭子即是如此：

- 1 鄜延路经略安抚使
- 2 契勘河东路都统制李武功有招集到
- 3 收复河东故地人兵甚众，内结义首领
- 4 及可以倚仗人，委见忠义，不负
- 5 朝廷。李实，今借补武校尉，须专指挥。

6 右箭付李实。準此。

7 建炎二年正月初八日^②

又如《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所载《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第85页文书也是此种形式：

1 [第]十队将杨仲与申：契勘所管汉弓箭手

2 [人]马，先準使衙指挥，给假拾日，前去本将□

3 般取口食衣装。今来给假回除，点得实到

4 [已]外，有马军壹名，第七将汉二十七指挥张

5 □不到。伏乞行下第七将发遣，及乞严

6 □诚约施行。

7 右札付第七将，立便将张景押

8 解赴当司出头，不得迟滞。準此。

9 第七将

10 [建] 炎元年九月十五日（此处有签押）

以上两件宋代箭子，是宋代公文下行文的一种，其基本结构是首列行文主体（如前者的行文主体是“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后者的首行已缺，据内容推测行文主体也应是“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次列行文事由，再列箭付内容，最后是时间落款。箭付内容即行文主体下达的指示和命令，其标志性用语都是“右箭付……准此”的句式，其位置都是作为全文的结束语而置于年款之前。安排官文书残存部分与上举宋代两件箭子尾部的书式完全相同，因此其公文性质为箭子可无疑义。

二、关于安排官的职官性质和机构属性

我们现在所见的安排官文书是一个残件，除了尾部完整之外，其事由部分大部已缺，如果根据4行有一事项符号，1至3行为一不完整的事项内容看，可以推测该件原列事项至少有两项。而在可以判断的两个事项中，其残存的内容尽管无法全解，然而可以看出都与财计有关，例如前一个事项内容“拾天内交还钱陆[干][捌][□][捌][伯][□]外欠钱叁千叁[□]柒伯文。收索不与，乞索打算”，其中的“拾天内交还钱”若干、“外欠钱”若干、“收索不与，乞索打算”等，均涉财计内容。^③再如后一个事项内容“限[公]春善[乾祐十一年][典到]为文，其不见有文契，知见人没[赏]来，收索不与”，其中的“公春善”似是

人名，“[典到]为文，其不见有文契”似是谈有关典卖契约的问题，“知见人”是唐宋时期契约中常见的词语，指订立契约的见证人。“收索不与”的“收索”一语在宋代的用法也往往与财物的收取有关，^④本文书前一事项也使用有此语，说明后一个事项内容也涉及财计活动。基于以上认识，可知安排官下达的此件箭子属于经济活动之类的财计文书。

以上对于安排官文书性质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安排官职官的性质和安排官所在机构的部门职能。首先，根据安排官下达的箭子属于财计方面的文书，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管理财计至少应是安排官的一项重要职能，这一点还可以从黑水城所出西夏南边榷场使文书得到证实。西夏南边榷场使文书分别收录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和《英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的西夏南边榷场使文书共15件，分别见于该册的第279—286页。《英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的西夏南边榷场使文书共2件，分别见于该册的第295页和315页。这些榷场使文书均是残片，无一件完整者。对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南边榷场使文书残片，日本学者佐藤贵保先生曾有专文研究，^⑤他在整合文书残片的基础上，对文书的书写格式进行了重点讨论，形成了最初的南边榷场使文书的复原书式。今将佐藤贵保的南边榷场使文书复原书式录如下：

南边榷场使 申

准（银牌）安排官頭子，所有{地名}^⑥住户{人名}（等部），（将到{物品名}or……）依法搜检，并无违禁。其（{人名}无带or上件）（物品名），尽（出）卖（了绝），替頭博买到回货，依例扭算收（上）税（上）历，会（为）印讫，仍将（博买）回货，（开坐下项or下项开坐），（一就）发遣赴{上级官厅}前去。伏乞照会作何，须至申上者。

{人名}{物品名}{数量}计{数量}
……博买川绢价{数量}计{数量}……收税
{物品名}{数量}计{数量}……

谨状

{日付}榷场使兼拘榷西凉府签判（押字）{人名}

佐藤贵保先生上文，尤其是复原的文书书式对于西夏南边榷场使文书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但由于材料所限，复原的文书书式仍有一些重要的缺漏。笔者指导的研究生许会玲曾在佐藤贵保

氏的基础上，又结合在《英藏黑水城文献》新发现的两件南边榷场使文书残片，对佐藤氏复原的文书书式进行了验证和补充，最终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文书复原书式。许会玲书式最重要的补充是将佐藤贵保氏书式的结束语“谨状”一句补充成了如下内容和格式：

右谨具申

银牌安排所。谨状

许会玲以上补充实际上非常重要，南边榷场使文书呈报的对象——银牌安排所也因此而明确。

佐藤贵保、许会玲复原的南边榷场使文书书式对于我们认识安排官的性质和职能很有参考价值。我们从书式可见，南边榷场使负责搜检进入榷场的商人输出商品是否有违禁物品，是依据“（银牌）安排官頭子”而行使权力的^⑦，对输入商品的“回货”，还要“依例扭算收（上）税（上）历，会（为）印讞”，并且要将这些“博买”的“回货”列表上报银牌安排所（即“右谨具申银牌安排所。谨状”），并听候指示（即“伏乞照会作何”）。可见，银牌安排所是负责管理边境贸易的南边榷场使的上级部门。安排官管理财计的职能于此得到证实。

其次，根据安排官下达箭子给三司，而三司具有财经部门的性质，这也可以判断出安排官具有管理财计的职能。我们从安排官文书7行“右箭付三司芭里你令布[]准此”等语可见，安排官要求“三司芭里你令布”按照箭子规定的指令执行。“芭里你令布”应是西夏人名，其中的“芭里”为姓，“你令布”应为名，俄藏黑水城文献编号 JX2822《杂字·蕃姓名第二》即有“芭里”一姓（见第6册第138页。）芭里你令布应是三司的官员。尽管安排官给三司芭里你令布箭子的全部指令内容不详，但我们根据此语可以判断出安排官与三司芭里你令布的相互关系。所谓“箭付……准此”的句式，在宋代官文书中通常是上级部门下达给所属部门的指令语。“箭付”的本意是指“下达箭子”，属于使动词，但这一用语久而久之变成了名词，《廿二史札记》卷28《金以坏和议而亡》即称：“札付者，上行下之檄也。”赵翼认为金代的札付就已是一种独立的公文文体。元代《习吏幼学指南·公式》：“箭付，《演义》曰：‘栳也。以木为牒，简笈之属。’又刺著为书曰箭，以文相与曰付。犹畀赐也。”也说明元代的札付属于下行文。因此，西夏的安排官下达箭子给三司，也应表明安排官是三司的上级官员，三司则是安排官的下属机

构。

关于西夏的三司，《宋史·夏国传》称元昊袭封之后，“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其中枢机构建置有中书、枢密、三司和御史台，三司似是模仿宋朝相当于“计省”的“三司”。但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汉文译本内容看，西夏的三司至少有两类，一类可能属于中枢机构，类似宋代总掌全国财计的“三司”，另一类可能属于地方性的机构。例如第9章《行狱杖门》有“铁索、铁锁、与无等[]京师令三司为之，边中令其处罚贫中为之。”第10章《司序行文门》所列次等司有三司。这里的三司无疑属于中枢机构。又如第20章《罪则不同门》“有所遣行，经略使局分司所在处三司所属有罚贖，则当于其中予之。若无，则于所属地方内三司、群牧司所属之官畜、谷、钱、物中如数出予，当明之而行登录。”这里的三司无疑属于地方性的机构。

总而言之，从上引以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所记内容可以判断，西夏“三司”为一机构名称，有中枢机构与地方机构之别，但无论是中枢机构还是地方机构，三司执掌都与财计有关。所以，安排官文书既表明三司为安排官的下属。也当然说明了安排官所本身就是财计机构。

三、安排官文书箭子属性确定的意义

安排官文书证实，西夏汉文的公文中也存在类似宋代箭子的文体，其公文名称、格式、用语应与宋代类同，安排官的下行文至少有箭子一种。这一结论对于我们研究西夏公文制度和西夏制度与宋代的制度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西夏公文用文字除了西夏文之外还包括汉文，汉文可以作为公文用文字在西夏政务运作中的公文文书中使用。西夏文作为西夏的“国书”在公文制度大量普遍运用无须赘举，但汉文是否可以作为公文使用的文字，这在传世的西夏史料中没有明确的记载，《西夏书事》卷12只说：“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立番汉二字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字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字掌西

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所谓“番汉二字院”之“字”，学者一般认为是“学”之误，“番汉二字院”即指“番学院”和“汉学院”。但汉学院“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则是说汉学院职掌翻译与“中国往来表奏”，其形式是“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这里只是说汉学院对与宋朝交往时文书需要汉文、西夏文双语翻译。至于在西夏国内的公文中是否使用汉字，汉字是否也与西夏文双语并译，《西夏书事》没有涉及。而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特别是本文上举安排官文书、南边榷场使文书则以实物文献无可辩驳地证实，在西夏公文行用中也同样可以使用汉字，汉字也是西夏公文使用的文字之一，尽管我们不知道它是与西夏文配合使用作为西夏文的译本，还是作为独立文本单独使用，至少不是在同一件公文中双语并译。^③

第二，西夏汉文公文的文体目前已知至少有三种。一是即本文专门研究对象——安排官文书所见的箭子，二是上引西夏南边榷场使文书所见、由佐藤贵保先生复原的申状，^④三是西夏南边榷场使文书所提到的“银牌安排官头子”。

第三，西夏汉文公文制度相当程度上取则于宋代。安排官文书显示西夏汉文公文中的箭子在公文名称、格式、用语上颇类似宋代，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西夏汉文箭子的文体直接来源于宋朝。我们知道，唐宋时期“箭子”文体盛行，但公文中作为下行文的“箭子”却是宋代兴起。宋初徐度《却扫编》卷上记载宋太祖时：“唐之政令虽出于中书门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别号曰政事堂，犹今之都堂也。故号令四方，其所下书曰‘堂帖’。国初犹因此制，赵韩王（普）在中书，权任颇专，故当时以谓堂帖势力重于敕命，寻有诏禁止。其后中书指挥事，凡不降敕者曰‘箭子’，犹堂帖也。”引文中的“赵韩王”即宋太祖宰相赵普。这是宋初“箭子”作为下行文开始兴起的情况。以后，“箭子”行用范围渐广，监司行文州县以及下属也多用箭子，如上文引用的鄯延路经略安抚使的箭子即是其中之一。箭子作为下行文首先开始于宋朝，那么，西夏公文中使用箭子文体也必然来源于宋朝无疑。《宋史》卷486《夏国传下》称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既然西夏的官制“多与宋同”，与官制密切相关的公文制度也必然相当程度上取则于宋代，

西夏安排官汉文文书给我们提供了直接的实物和证据。

注释：

① 《中国藏西夏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66页。

② 见《文物》1972年第4期丁明夷《灵石县发现的宋代抗金文件》

③ 例如“打算”一词，宋人刘昌诗撰《芦浦笔记》卷3《打字》有云：“结算谓之打算。”《宋史》卷416《汪立信传》：“鄂州围解，贾似道既罔上要功，恶阍外之臣与己分功，乃行打算法于诸路，欲以军兴时支散官物为罪，击去之。光祖与葵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稽勾簿书，卒不能得其疵。”《两朝纲目备要》卷8总所拘监司算纲运条：“嘉泰四年刑部员外郎刘述提举江东常平公事坐事免，去而湖广总领吴玠申省云述欠本所纲运甚多，请留之打算。”宋王之望撰《汉滨集》卷8《乞推赏知通应副贍军钱物增额朝札》：“四川官吏莫不欣然，悉心遵奉，各务协济，本所不遣一卒，不差一官，不追一吏，以相督责，而逐处钱物按月而至，争赴期会，以取增羨，三十一年终打算，实到库钱物纽计钱引比祖额计增二百六十万七千八百五十二道，比绍兴三十年增三百八十五万六千九百九十七道。”

④ 关于收索一语的含义，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106所收司马光《上神宗乞选河北监司賑济饥民》：“若富室有蓄积者，官给印历，听其举贷，候丰熟日官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诱，则将来百姓争务蓄积。”《宋名臣奏议》卷112苏轼《上神宗论新法》：“若此钱果不抑配，则愿请之户后必难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后有失陷之责。”明胡我琨《钱通》卷18引《转移因录》：“宋京师有覃兴、卫州石密同财作客商。一日，覃请石曰：河北冀贝二州有钱三百贯，请石同往收索之。石临行，市店肉吃食，因置药毒覃先行，路中闻覃已死，因独取钱往卫州作一解库。忽见覃来，石谓其未死，与之相揖。”

⑤ 佐藤贵保：《ロシア藏カウホト出土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经帙文书の研究——西夏榷场使关连汉文文书群を中心に》，见《东トルキスタン出土“胡语文书”の综合调查》，2006年。

⑥ ①里面的内容代表有些文书省略的部分，②里面的内容代表不确定的内容。

⑦ 头子是一种公文文体，汪圣铎先生有《宋代头子、宣头考略》一文，认为宋代的头子除了枢密院下达的驿马头子外，头子还有以下几种作用：一是作为便钱券，发放给军队，是军俸的一部分；二是由枢密院、宣徽院下达的，是用于奖赏开拓边疆有功者，类似官员委任状或是有功德凭证等；三是由尚书省下达的头子；四是作用与头引相似，在北宋中后期，诸路州县衙门在采购物品时，表示尚未付钱的一种特殊的凭证。许会玲认为西夏的汉文译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头字”

应即宋代的“头子”，其来源应基本承袭中原制度。

⑧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16页有汉文《光定十三年千户刘寨杀了人口状》，其中几行人名旁注有西夏文，但不是全文注西夏文。汉文世俗文书中仅见此一例。

⑨ 前面提到的《光定十三年千户刘寨杀了人口状》，

也应属于公文，且是申状。

作者简介：孙继民，男，1955年生，河北邯郸人，历史学博士，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邯郸学院特聘教授，河北石家庄，050051。

从星宿神灵崇拜看西夏文化的杂糅性

崔红芬

中古时期，人们对日月星辰的运行缺乏科学的认识，对很多天体现象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因而对其充满了敬畏。人们认为十一星曜、十二宫和二十八宿的运行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预示着人类的幸福或灾祸。只有虔诚崇拜和供奉各种天体神灵，才能祈福消灾，远离病痛，福寿绵长，官禄无忧，国祚长久。内迁之前，党项与吐蕃为邻，党项与吐蕃两个民族在生活习俗、经济结构、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很多相通、相似之处。内迁及建立政权后，党项人又借鉴和吸收汉文化，且境内不同民族杂居生活，可以说党项人的星曜观念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藏以及印度等文化的共同影响，他们把佛教中天体星宿观念与原始宗教中天体神灵的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西夏人对天体星宿神灵的认识观，体现其文化的多元化、民族化和地域化的特点。

一、有关星宿信仰的经典

西夏是以党项人为主体的在西北建立的多民族联合政权，统治者推崇佛教，有关炽盛光佛和诸星曜的经典以西夏文或汉文的形式在其境内流行。西夏故地出土的有关天体、星宿的经典很多，仅在俄藏黑水城藏品中就有：西夏文《圣星母中道法事供养典》（第686-687号，西夏特藏第78号，馆册第4737、7122号）、《佛说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第198-199号，西夏特藏第144号，馆册第809、951号）、《佛说大威德炽盛光诸星宿调伏灾消吉祥陀罗尼》（第196-197号，西夏特藏第157号，

馆册第5402、7038号）、《佛说圣星母陀罗尼经》（第259-267号，西夏特藏第142号，馆册第571、2528、6484、572、6879、577、6541、696、705、699、706、5402号）；汉文《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如来陀罗尼经》（TK-129、130、131）、《佛说普遍光明焰蔓清净炽盛思惟如意宝印心无能胜总持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TK-103、107）和《大威德炽盛光消灾吉祥陀罗尼》（Дх1390）等。这些经典或译自汉文，或译自藏文，内容与密教坛城、经咒有密切关系。人们希望通过设坛城、作法事、诵持密咒和观想炽盛光佛等佛事活动，达到祈福消灾的目的。

二、遗存星宿绘画

盛唐以来炽盛光佛信仰十分流行，据孟嗣徽考证，现存于国内外的炽盛光佛变相图共有13幅之多。^①在内地、河西和吐鲁番等地都发现有炽盛光佛及二十八星宿的绘画、壁画等。日本奈良县也发现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及卷首扉画星图。^②西夏占领河西地区后，统治者采取推崇佛教的政策，炽盛光佛信仰继续兴盛，星曜绘画、壁画大量存在。

1. 东千佛洞第1窟东壁（左壁）正中绘炽盛光佛经变一铺，炽盛光佛双手持金轮，结跏趺坐于莲座上，头上有华盖。两侧内容分三层布局，下面是九曜星神簇拥着炽盛光佛，可辨认者仅有水星、金星和木星等。中间是二十八宿神像，是站在祥云中的二十八位天人形象，文官装